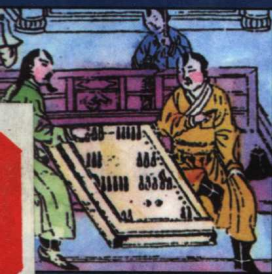


博者賭

賭博史

戈春源著



中国历史上
形形色色的赌博

赌博与各式人物
赌博史上的骗术
赌博古今罪恶录
中国历史上的禁赌
中国历史上的赌场赌窟



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

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

赌博史

戈春源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张呈富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版面设计：董允国

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

赌 博 史

支春源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8 字数 163,000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5,001—11,000 册

ISBN 7-5321-1086-9/I·809 定价：10.80 元

前 言

赌博作为人类的文化形态之一，决不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“牧猪奴之戏”或无足轻重的“小道”，而是一种对人类生活机制产生相当影响的社会现象。所谓赌博，是根据事先约定的规则，采用某种方式进行竞争，分出胜负，决定输赢。它在原始社会末期，从游戏的蜕化中产生，从娱乐的边缘滑向异途，反映了某些社会心态与情趣。它不仅助长了贪婪、狡诈的罪恶风气，而且造成了社会、家庭及个人的种种不幸，历史上以赌博而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。但赌博又能满足人们投机取巧、侥幸取胜的心理需要，还有一些消闲解愁、甚至说是发越机智的作用，因此具有很大的诱惑力，沉溺于赌海者大有人在，历朝历代屡禁而不绝。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，还给赌博增添了新的动力，一些新式博戏如电子游戏机之类应运而生。那末，赌博这个文化怪胎的实质是什么，它的发展过程怎样？为何如此顽劣？禁赌的法理机制如何健全？这些都是值得研讨的问题。抱着这个目的，本人不揣浅陋，写了这本小书。

赌博种类极其繁多，凡竞技、斗智、碰运气等，几乎都可以成为赌博。从赌具来看，可利用自然物进行竞斗（如斗鸡之类），也可用人造的棋牌进行博戏，还可以是人与人的直

接斗智搏力。现在，一般把赌博分成三种，一种是竞技性质的赌博，主要是凭借自身的体力、技巧来博取“胜利”；另一种是依靠侥幸机遇的赌博，如猜数字、甩钱儿、掷骰子之类；再一种是既有技巧又有机运的赌博，如风行全球的打麻将，既要靠牌运顺当，又要靠技巧的高超才能获胜。在我国流行的赌博中，这几类赌博都大量存在。

下面，我想重点谈一谈中国赌博文化的一些特点。

赌博这种属于行为系统的病态文化，是一定的社会特性的表现。它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，也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。由于各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不同、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，而形成各种不同的赌博文化。中国的赌博文化由于根植在自己几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中，因此具有自身的许多特点。

中国赌博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有着较强的封建性。长期以来，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内涵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，封建制度持续之长为世界所罕见。封建的思想意识、礼乐制度，几乎无孔不入地影响到各类社会风俗。中国的一些传统博戏强烈地反映了儒家的“三纲五常”的伦理观念和封建等级思想。“六博”中有“枭”棋与“散”棋的区别，在下博时，“枭”可以杀“散”，而“散”不能直接杀“枭”，说明“枭”的地位高贵而“散”低贱，即所谓“博者贵枭”之说^①。樗蒲中的博采，有“王采”与普通采的区别，如掷得的骰点组成“王采”的，可以获得连掷等特权。又如在“打天九”中，凡摸到“至尊”（意为皇帝，由“么二”与“二四”两张牌组成）的算是最大的牌，拥有至高无上的“权力”，可以吃掉点子最大的天牌一对，其

^① 《韩非子·外储说》左下篇。

余参赌人员都要输他二注。还有一些博戏项目，本身就按人的贵贱制订了不平等的竞赛规则。如“投壶”规定，地位高的可以把箭放在地上，投一箭，拾一箭；而地位低的必须用一只手抱箭，以另一只手投掷，增加了投掷的困难，这使地位低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^①。传统博戏中还存在明显的男尊女卑思想。有些传统项目，如射侯、投壶、竞渡等，按成例几乎成了男子的专利，似不允许妇女染指。妇女只能参加斗草、斗叶儿、“打马”等一类文雅小博，在参加项目与活动范围方面对妇女作了较大限制。在博戏时，还往往把妇女视为玩物，如有一种掷骰行棋的博戏“响屣谱”，棋盘用纸或竹木做成，而棋子（也叫“马”）往往临时取在座妇女的绣鞋充作，含有明显的玩弄女性意味。可见古代博戏存在对下层劳动人民与妇女的歧视。

最后，是“学而优则仕”与功名利禄思想对赌博的影响。科举制度，是封建统治者选拔官吏而设，既是对人才的笼络，也是对他们的禁锢。在漫长的封建时代，通过寒窗苦读、参加科举而猎取功名，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，这是当时读书人的苦苦追求。这种陈腐的封建意识，在中国传统博戏中亦有所体现。如利用掷骰子比赌的“状元筹”，凡掷出几个骰子的点数组组合，成“状元”时，便算获得全胜。又如“升官图”，是根据每人所掷的骰点，用棋在注有官秩的棋格上行走，由卑秩向高职，最先达到极品（清朝为军机大臣）者为赢。与“升官图”类似的“打马”，每人的棋子根据自己所掷的骰点，按一定的规则沿着线路前进，从“赤岸驿”始发，最后到“尚乘局”，亦似武士从驿站长上升到皇帝近待的一条升官途径。这些博戏

^① 参见[明]汪祿《投壶仪节》。

体现了功名成败、官场浮沉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。当时一些官僚、士子特别喜欢这类博戏，是因为他们把这种博戏作为科举与仕途的预测或是在官场、考场失意后聊作安慰，使他们追求名利的思想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某些满足，因此从隋唐以来的上千年中长盛不衰。从上可见，中国的一些赌博中渗透着强烈的封建意识，这种以维护剥削和等级制度、宣扬封建道德和名利思想为基本特征的意识，通过赌博这个载体潜移默化地毒化社会，其危害性甚大。

中国赌博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。中国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由于农业水利工程建设需要，很早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，这就使我国古代的生产活动带有群体性与村社化的倾向。我国是处于内陆文明的、以农为本的国家，农业生产周期较长，生活节奏缓慢，加之长期以来游艺领域为儒家“寓教于乐”的思想所垄断，这就决定了我国赌博在方法上的固定性与集体性。中国人喜欢在固定的环境中进行赌博，赌博场所都是预先约定，参加者多为经常碰头的熟人，赌具也就是常吊这么几种，很少变化，而且多为集体项目，如“碰麻将”必须是四人，少一人就不行，“马吊”、“宣和牌”等多数要在三人以上。赌博时间也特别长，可以轮流反复，甚至使“农失其时，工失其艺”^①。中国人对于一些无准备的赌博是不习惯的，也很少参加。而欧美赌博与中国却有明显不同，他们的赌博经常是个人想出来的，多为两人共戏，可不使用固定的赌具而随机进行；甚至可以不要起码的赌博设备，在陌生人中赌起来，许多人像做生意似的，进行一次就算结束，这与一些人充满投机心理的商人

^① 徐珂《清稗类钞·赌博类》。

气质分不开的。

中华民族是勤劳、勇敢、务实的民族，对于与渔猎有关的实用性竞技项目特别重视；中华民族具有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与连绵不断的卫国战争在世界史上尚属罕见。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赌博具有实“战”和实用性质。中国人特别喜欢技巧性赌博，把一些体育竞赛项目，如射箭、拔河、棋类等用于赌博，也就是直接把这种体力或智巧的比试作为赌博的重要手段。赌赛时，赌博双方让自己参加进去，以决雌雄。而欧美人却不同，他们的赌博不是亲自参加“搏杀”，而是从旁观的立场上猜测其结果。欧美人也特别喜欢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博戏，他们通常在全部或大部都属于运气的游戏和事件进行赌博。如掷骰子，它的点子是不能控制的，美国人就特别喜欢。又如，素称赌业兴旺发达的英国人亦喜欢投机性赌博。著名的威廉·晓尔和勒卜两赌博公司就开设许多奇怪的投机性赌项，如女人生什么性别的孩子，政党选举谁获胜，天气晴雨，世界杯足球赛何国摘桂，都能成为赌题。所以一般人认为，中国人的赌博很重视它的实“战”性，是真正的竞争，而欧美人的赌博基本上是投机，是一种商人行为的博戏化。

再次，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，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精神产品与灿烂的文化，中国人有自己优美的语言文字，蕴含着丰厚的文化沉积。中国有一些博戏就吸收了民族文化的各种要素，使博戏富有艺术性、知识性。“斗草”中，不仅要求熟悉草的名称，鉴别花草的种类，还要在对答中对仗工整、词语恰当。如挑战者拿出一枝半边莲，应战者就必须拿出与之相对的草“一年蓬”、“一串红”等作答。这就要求斗草的双

方都要具备丰富的植物学知识与文学对仗功夫。斗蟋、斗鸡等博戏，要求参赌者具有饲养昆虫和家禽的经验。“灯谜”中有些格式如对偶格、卷帘格等均与修辞技巧相联系；“灯谜”中所猜的人名、地名、成语、典故与中国文史、地理的关系极其密切；字谜，更要有些文字学知识才能射中。而围棋、象棋、“打马”等博戏中，都存在哲学推理与运筹计算等中国式机智，真所谓“神机妙算，决胜此中”^①。上面这些文雅的博戏，显示了中国人高度的艺术修养、知识水平与成熟的思维方式，体现了一种民族特有的精神与风范。

中国赌博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隐蔽性。在儒家“君子不博”思想的支配下，中国历朝政府对赌博严行禁止，使中国的赌博活动呈隐蔽状态。首先是使用隐语。宋朝时，凡在赌博中取得大胜叫“松子量”，把骰子称作“惺惺二十一”，因骰子有六面，共二十一点，故称^②。明清江湖切口，称赌为“拽条”，赌客叫“挑生”、“浑是胆”或“珠履三千”，赢为“上手”，输为“伤手”等。在打麻将中，称骰子叫“球”，侍赌者讨赏叫“打抽丰”（后讹为“打秋风”）；“花会”赌博，称赌场为“摇堂”，天牌为“天外”，地牌为“重浊”等等^③，不一而足。赌博隐语的产生，主要是赌徒为了便于暗中联络，以防赌局被发现而遭惩罚。同时也是为了便于设下赌博骗局，去骗“瘟生”。

其次是进行流动“作战”，也就是那些赌徒经常更换赌博地点，进行游击式的赌博。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有个大赌窟，一直在虹口一带流动，并没有固定地点，他们在一个

① [清]郑晋德《棋诗》。

② [宋]陶谷《清异录》。

③ 参见曲广斌《中国民间秘密语》第262页，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。陈默《黑话探秘·赌博类》，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。

地方多则月余，少则几天即转移，以防被识破，加之采取了其他“防卫”措施，结果这个赌窟持续了好长时间。直至近年，台北、上海等地还发现过这种“飞牌”式的赌博集团。温州地区有些赌徒组成“游击兵团”，几十个人甚至一二百人结成一伙到处流窜，碰到合适的地方便“安营扎寨”，“耍”起钱来，“耍”时还派出岗哨，作为警戒。在东北地区，也发现一些赌团，临时找个地方，进行“快聚、快赌、快散”的支锅式赌博，赌完即散，速战速决，难于发现^①。近年有些赌徒还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进行“流赌”，晚上飞车夜赌者不乏其人，方法亦有多种，一是让车慢慢开着，随着车轮的滚动，边吃边赌，这叫“走”，另一种是把车停下来，在山洼背风处聚赌，如果有人来抓，就飞身上车，玩命儿跑，这叫“避”^②。

再次是“地下活动”，就是找一个秘密地点，用暗号联络，进行聚赌。在清朝时，有些青年人“或丛箐中辟密室，或匿舟港汉复曲之处，风雨深夜，相聚而戏。”^③近年，一些赌博团伙集中到城镇的旅社内、曲径小巷的尽头、风景区的僻静处进行“搏杀”，甚至还有有的把赌场设在港汉密布、芦苇深处的船上。一些家庭赌场，赌时紧闭门窗，挂上窗帘，铺上台毯，以防灯光外透，声响外溢。在上海竟发现过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赌窟，有个女赌徒把她房间下面的六平方米的地下室辟作赌场，赌时紧关房门，盖上地板，极为隐蔽。

最后，赌徒们作赌手段也有隐蔽化的趋势，赌博的时间放在深夜，而且赌桌上看不见钱币，而是用石子、黄豆、纸

① 魏逸亭等《东北三省赌风透视》，见1992年2月18日《瞭望》。

② 瘦孩等著《出租车世界》第23页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。

③ 《清稗类钞·赌博类》。

片、香烟等作为计算筹码，假装娱乐，到局终结帐时才兑成现钞，以便掩人耳目。赌博的隐蔽性与一个国家的法制、治安状况大有关系，一般来说，越是政治清明、法制严密，其隐蔽程度也就越深，作赌手段也更狡猾。由于中国鄙视博戏，长期禁赌，除了少数时代与特殊地区外，赌博活动总显得掩掩遮遮，隐而不露，构成了中国赌博文化的一大特色。

中国赌博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它的渐变性。由于中国赌博多集体项目，有固定的程式，约定俗成的规则，所以一旦形成、流行之后相对稳定，不易变化。如古老的六博、樗蒲、马吊等都流传了几百年、上千年，甚至有的赌项还一直流传至今。即使该赌项消失后，它的一些打法也可能会溶入新的赌博中。但赌博毕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，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赌博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些变化，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。中国赌博变动最大的是明朝中叶与鸦片战争以后两个时期。明朝中后期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，与之相应，产生了市民意识和初步的民主思想。这反映在博戏中是对严格的封建伦理与制度的某些反抗。例如，在明末产生的“马吊”中，公开把《水浒》中的人物，作为叶子上的图像。“尊万万贯”是天魁星呼保义宋江，“千万”是天伤星行者武松，“百万”是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，直至“一万”浪子燕青。这说明人民对于一些农民起义领袖的尊重与怀念。“马吊”中，还把“钱”看得很轻，在文钱门里，以“空没文”（即一钱也没有）为最大的牌，“半文钱”为次大的牌，而最小的牌却是“九钱”。这可以说是对金钱的唾弃，对权贵的蔑视。产生于清朝的麻将牌，各牌的关系较平等，没有严格的主从尊卑，没有隶属关系，一筒与九筒分不出谁大谁小，东、南、

西、北风出牌时也没有先后顺序，只有在出牌过程中，才能体现它的价值。一张不显眼的牌在“糊”中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，但这种作用亦很短暂，在下副牌中这种作用很有可能不存在了。而且什么牌都有“糊”的可能，如摸了最早的既不靠也不连的牌，便可以打“大乱”（也称“十三勿搭”）。麻将牌本来要求连贯，以三张相连为基本单位，而“大乱”则要求“断”，可以“一、四、七”或“三、六、九”等等；也不一定以三张为单元，也可两张，如家中对子很多，可以打“七对子”。这是以“没有章法”来代替章法，以散漫代替整齐，具有打破常规的叛逆精神，说明民主、平等的观念在进一步提高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带来了近代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，也带来精神文明和包括赌博在内的恶习。这表现在赌博项目的增多、赌博范围的扩大和赌博工具的现代化。如扑克、赛马、跑狗、博采及老虎机等都是这个时候输入的。这些新玩意“较之中国人每会必为牧猪奴等戏者大异矣。”^①以上都说明中国的赌博处在变化之中，不仅有纵向传承中的变化，而且还有横向传播中的相互影响，但这种变化仍是一种渐进的，非突变性的。甚至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会局赌博与普及全国的花会赌博，在开局或开筒时都有一些神秘的迷信活动，说明还残留落后的原始性。这也说明中国近代赌博是新旧交杂、土洋并举，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色彩。这种文化对于旧式博戏总是采取包容的态度。

总之，中国赌博文化是立足于本民族的较为稳定的文化，由于西方赌博的传入，显得庞杂缤纷。当然，它们中的糟粕部分，应剔除摒弃，但也不能简单地对它们全部否定，中国

^① 见黄远庸《昔日日记》（远生遗著）卷三。

的一些文雅的博戏，其内容与方式都含有民族优秀文化的合理内核，因此要用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制约，来缩小博戏的消极面，发扬其怡情陶性的积极面，使博戏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。

以上是对中国赌博文化大致的、粗浅的分析，看法不一定正确，望专家不吝指正。本书在写作过程中，承程德琪、殷伟仁、费成康诸先生的大力帮助和热心指导，在此一并表示谢忱。

戈春源1993年11月25日

于苏州铁道师院



汉·画像石·仙人六博



明·马掉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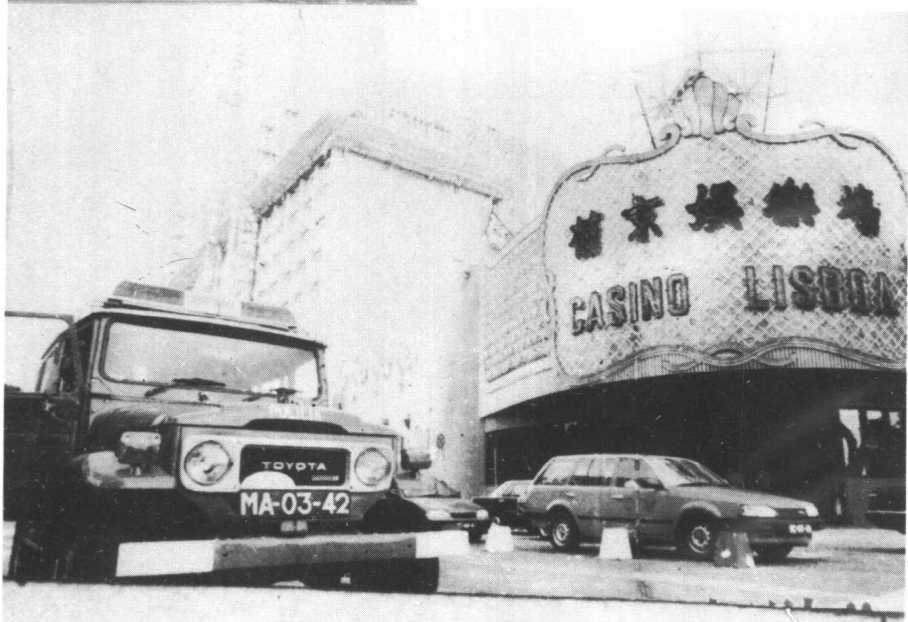


元·打双陆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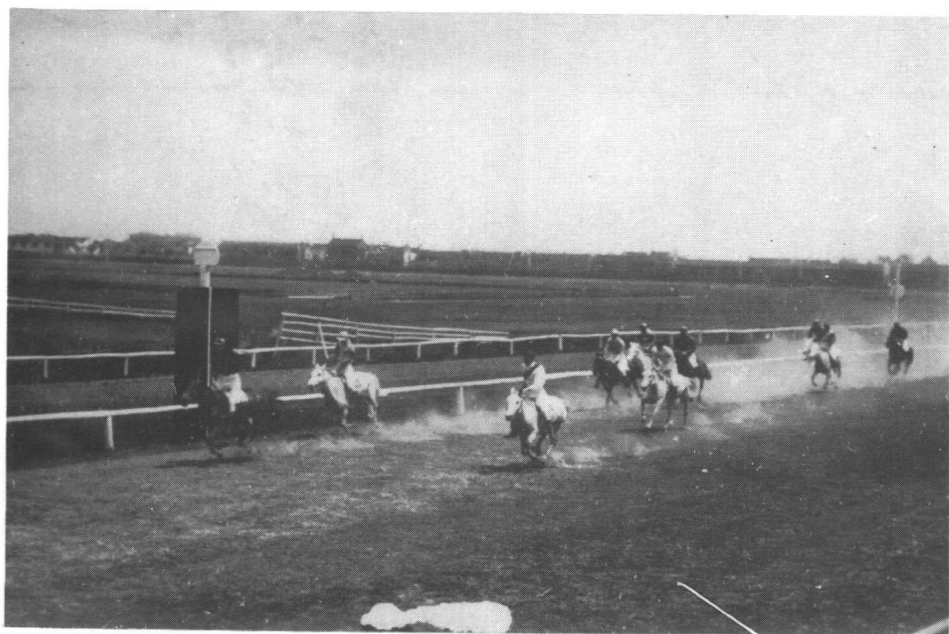
打花会的赌徒在石像前
烧香求梦，祈祷神灵保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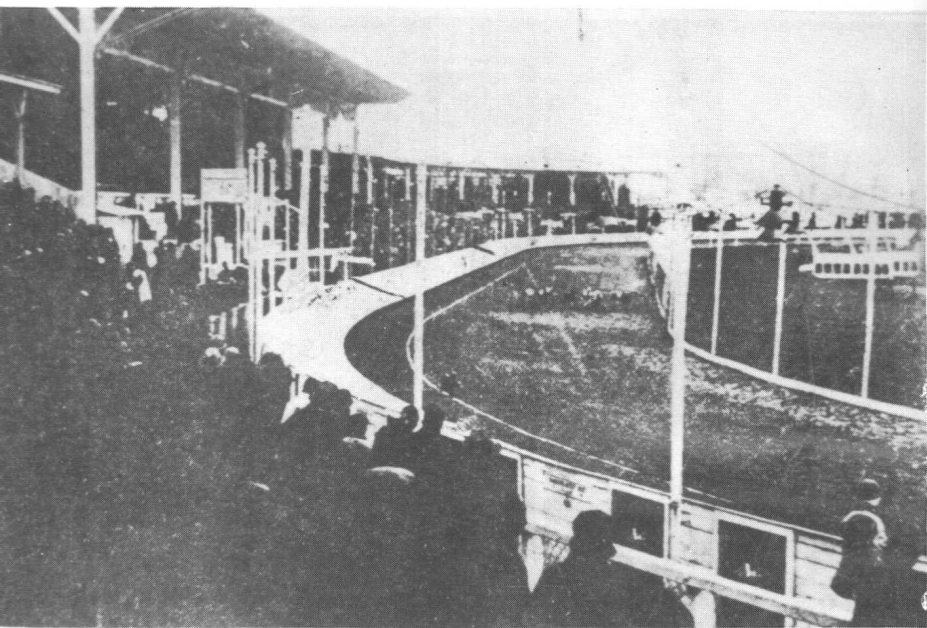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著名的赌场之一——澳门葡京娱乐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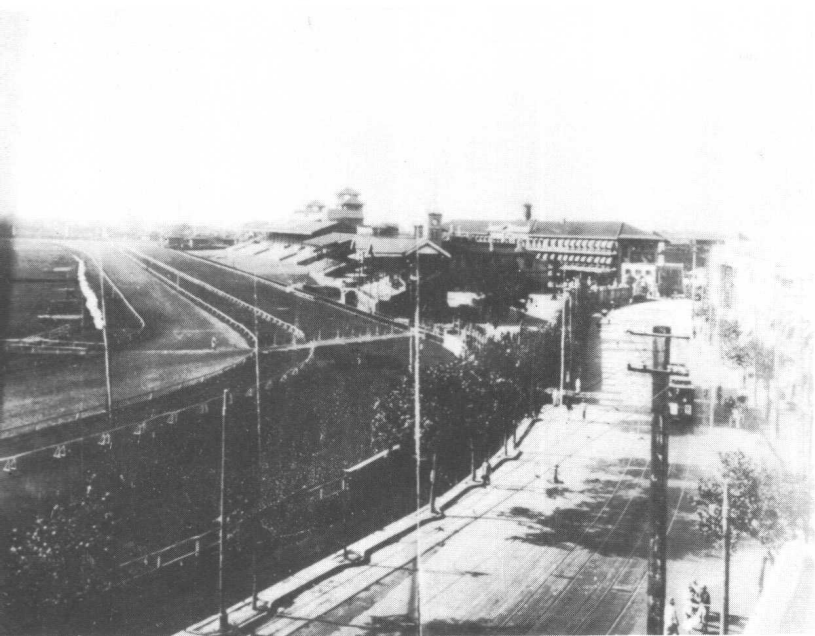
公子哥儿玩纸牌



旧时跑马情景（今上海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）



逸园跑狗场（今上海文化广场）



旧时上海跑马总会